

就历史的演变而言,只有在更长的时段里来看,才可能发现问题;就地区史的研究来说,也只有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思考和审视,才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所以,将专门史的研究,放在中国史这样的更为宽广的

背景下,才能凸显出这些专题的意义和份量。因此,主持者标举“中国史”,正可见其宏大的学术眼光。这一点,在现今史学界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细碎化、专门化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加倍注意。

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罗新慧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下文简称《清华简(壹)》)于2010年出版发行,在前言中,竹简整理者匠心独运,引述了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王国维应吴宓之邀所做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内容。王国维在演讲中申述了新材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甚至将汉代孔壁藏书、晋代汲冢书的发现,称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可见新材料之于学术研究特别是古史研究的特殊意义。《清华简(壹)》收录有简文九篇,对于辨析文献、考辨古史、厘清史迹,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试作论述。

一、《清华简(壹)》中,有不少篇章与《尚书》、《逸周书》有关,这对于进一步了解战国时期《尚书》的流传情况以及推定《逸周书》篇章的编成时代,大有裨益。

有关《尚书》,汉以来的传本主要有伏生本、孔壁本、河间献王本、秘府本、杜林本、孔

安国传本等。除伏生本为今文外,其余皆为古文。就其来源看,有官府收藏、也有民间所献。由于经文本身真伪难定、书篇流传状况不明,围绕《尚书》而展开的纠纷千百年来为数浩繁。

清华简中与《尚书》有关的篇目有《尹诰》(《尚书》为《咸有一德》)、《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尚书》为《金縢》),《咸有一德》列为古文而《金縢》在今文《尚书》内。两篇简文的面世,不但有助于解决围绕这两篇所引发的争讼,而且为了解战国时期《尚书》的流传情况提供了宝贵材料。

《咸有一德》篇,《史记·殷本纪》谓“伊尹作《咸有一德》”,《书序》说与司马迁同。然此篇向无师说,自梅鹗始,即不断有学者针对此篇,摘文择句,指其所本,判定其伪。清华简《尹诰》篇全文内容与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大不同,这种情况表明,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当为魏晋间人杂拾古语,附会而成,不是先秦古本。古人对于《咸有一德》的推断,得《尹诰》篇之证,可说确为不移之论。

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

志》篇自带标题,但其内容则与尚书《金縢》十分相似。《金縢》篇见采于《史记》,当非后人伪造。但自宋以来,儒者却对《金縢》之真伪不断起疑。其中,《金縢》记载武王生病之时,召公、太公建议“为王穆卜”,但为周公所拒,然而周公自己却在为武王禱后占卜吉凶,后儒据此以为周公之举近于“险人佞子”。但十分有意思的是,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中恰恰没有周公禱后行卜的记载。因此,后儒据此疑周公,进而疑《金縢》之真伪,证据或许并不充分。值得思考的是,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成书于何时,是否为《金縢》篇的原本?清华简此篇中有“周武王”之称,就此应当说是篇非出自西周史官实录,而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后人为作区分而如此写成。那么,竹简本与今本《金縢》又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引起学者无数兴趣。但无论如何,竹简本的出现,无疑表明《尚书》的流传在先秦时期已经呈现多源状况,《书》之流传较之以往所认识的情形更为复杂。这一点,对于考辨古代文献的流传,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简简文还涉及《逸周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周书》七十一篇”,自注为“周史记”,颜师古注“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逸周书》中若干篇目,文体极近《尚书》,而又有部分篇章文极平近,类于周秦诸子。总体来说,《逸周书》真贋参半,驳杂不纯,何篇为真,何篇为伪,始终未能确指。

清华简中与《逸周书》有关的篇目有《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逸周书》为《祭公》),简文的发现,对于推断《逸周书》中相关篇目的写作年代、真实程度,十分有益。今本《逸周书》亡《程寤》篇,后儒据《艺文类聚》所记补充正文,但由于其中记载并宣扬

武王之梦而被学者斥为近于讖纬而不可信。可是,清华简《程寤》中相关内容,却与后儒所补正相契合,显见儒者所补不误,武王之梦也非虚妄杜撰之语。此外,清华简《程寤》篇还表明,今本《逸周书》中部分篇目虽佚,但相关传本仍可能在社会中流传,至唐宋之际又经儒者记述而编入各类文献中。由此,又可知古代书之流传,绝非单一线索、或者源于一种传本。

今文《尚书》与《逸周书》,前者出于伏生,后者一般认为写于战国末季。但《逸周书》中多数篇目不但不是周末原本,并且也非汉、晋旧貌,而清华简《尹诰》、《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以及《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的面世,则使今人得以窥见古书之旧貌。

综之,清华简对于辨析古代相关文献的真伪、著作时代,以及了解古书流传的多样性、复杂性,弥足珍贵。

二、清华简所记内容,为探索上古史迹提供了新资料。

清华简中不少内容涉及周公事迹,如《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皇门》、《晷夜》等。周公为周初重要政治家,但是由于文献记载不一,导致周公有关事迹模糊不清。例如,周公“居东”,到底是周公东征,还是周公待罪于东,抑或是周公奔楚?千百年来向无定论。《诗经·豳风·东山》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意为周公东征三年;而《尚书·金縢》又说“周公居东二年”,两种文献一说三年,一为二年,说法的差异很容易导致人们将周公东征与周公居东视为两事。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记载“周公宅东三年”,“宅”与“居”义近,显然可以肯定居东与东征为一事,时间为三年,而有关周公东征、周公待罪于东的争论随之涣然冰释。《皇门》篇记载周公诰诫群臣,很

有可能是周公摄政之时的作品,清人就曾谓“此篇雄奇郁勃,的系周初文字”。但是,保存在今本《逸周书》中的《皇门》篇,文字多有错乱,不可竟读,如“以昏求臣,作威不祥,不屑惠听,无辜之乱辞是羞于王”句。清儒曾就此句展开辨析,王念孙认为此句当读为“以昏臣作威不祥不屑、惠听无辜之辞,乃惟不顺之辞,是羞于王”,而卢文弨则认为其中“不屑”当为“不肯”之讹。清华简《皇门》此句作“不肯惠听无罪之辞”,正可判定卢说之是而王释为非。《逸周书·皇门》还记载“王阜良,乃惟不顺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维直以应,维作诬以对,俾无依无助”,清人曾认为此王暗指成王,但清华简《皇门》此句谓“我王访良言于是人,斯乃非休德以应。乃维诈诟以答”,从上下文意、语气看,当指武王。此句透露出,周人建国之初,武王急于得到治国良策而遍访群贤。但是,这些所谓的殷遗、贤能之人竟以“诈诟以答”,使武王终无所得。这一记载,对于了解周初形势十分重要。众所周知,《尚书·洪范》篇记述了武王访于箕子,而箕子授之《洪范》九畴的史事。有学者就箕子所献九畴之法是否为建国良言提出置疑,今结合清华简《皇门》所记看,箕子所献是否亦有“维诈诟以答”的嫌疑,值得进一步探究。总之,《皇门》篇涉及周初史事,对于了解周公开始摄政之时的心理状态、周初的政治形势,十分宝贵。

清华简《楚居》篇记载了楚王世系、楚王居处与楚人的迁徙,其中不少内容不见于传世文献,是探研楚史不可多得的材料。楚史研究中,商与楚的关系历来受到重视。考古发掘显示商人与南方有着频繁的交通往来,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罗山天湖遗址皆显示楚与商的关系颇为密切。清华简《楚居》则记载,楚之先祖季连与商人盘庚之子从游,

楚人从此繁衍生息。这一记载虽不录于传世文献,但可以肯定,楚人的确与商人关系十分紧密。《楚居》篇又记载有楚之先祖诞生传说。有关楚之先祖的诞生故事,文献不乏记载,如《史记·楚世家》谓“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六曰季连,半姓,楚其后也”,《帝系》、《世本》也有类似记载,皆谓楚人先祖季连难产胁生。然而,与传世文献所记不同的是,《楚居》篇记载胁生者非为季连,而是丽季,并且《楚居》特别记载丽季之母在难产之后死去。另外,《楚居》还记载在丽季之母肋裂去世后,“巫裁该其肋以楚,抵今日楚人”,由此可见古代女子生育之时,巫者参与其中并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细致的记载,对于了解上古风俗、上古信仰、上古先民之生活,极其珍贵。《楚居》以及其他文献皆记楚人之胁生,不仅如此,夏之先祖大禹、商人先祖契在文献记载中亦为胁生,大禹胁生的故事可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论衡·奇怪篇》、《吴越春秋》等汉魏时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子羔》也记有“口也,观于伊而得之,妊,三年而劓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的记载亦见于《子羔》:“契之母,有媵氏之女也,游于中央之上,有燕衔卵而错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劓于膺,生乃呼曰……此,欵,是契也”。前辈学者曾引述佛经记载的佛陀胁生故事来说明胁生故事或由西方而来,但由清华简《楚居》以及上博简《子羔》篇来看,出自东方的商人、以及与商有密切关联的楚人也有胁生神话,或可说明胁生神话非必起源于西方。

清华简之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非本文上举一、二所能概括,相信随着探讨不断深入,清华简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将日益彰显。